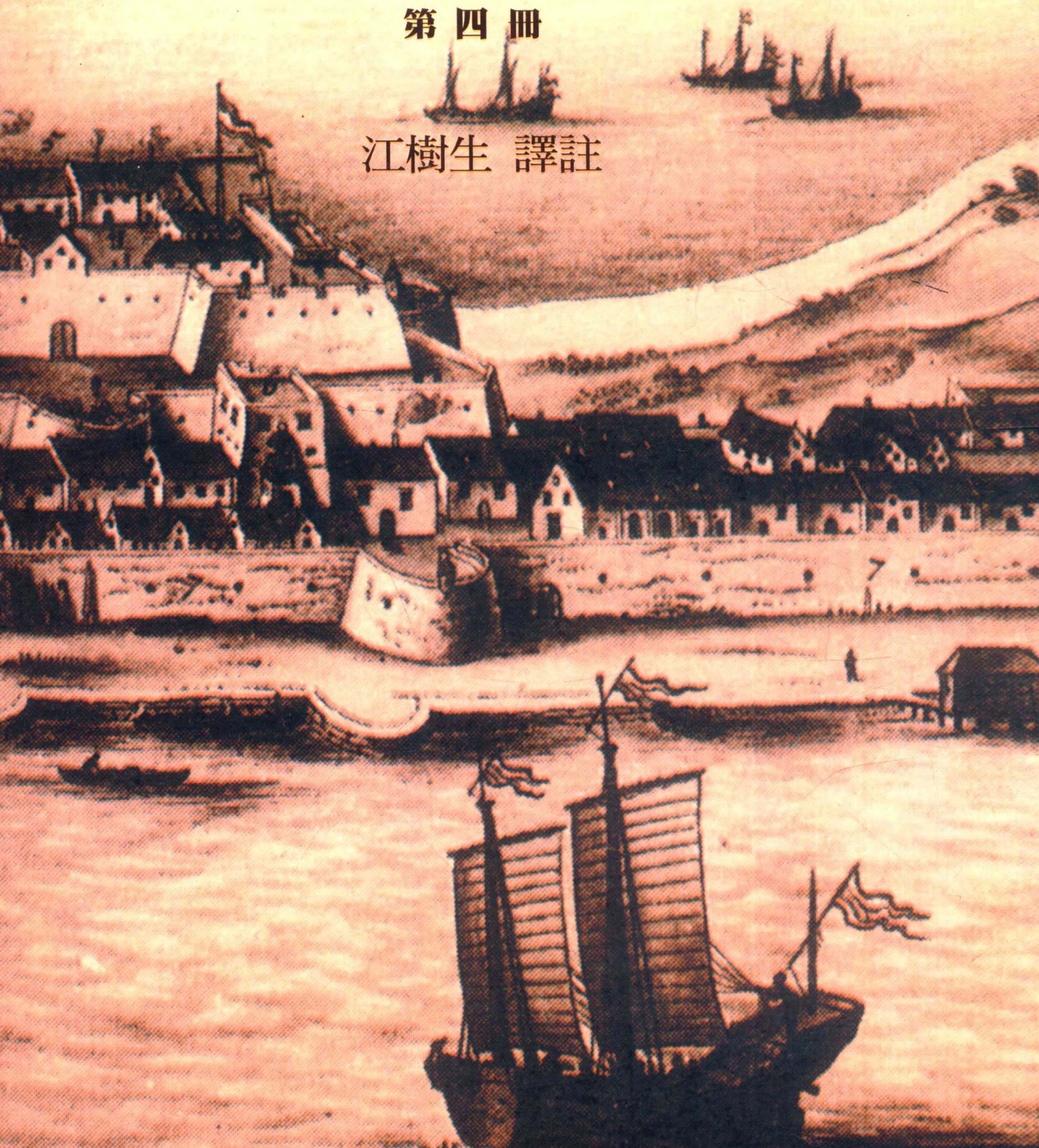


熱蘭遮城日誌

第四冊

江樹生 譯註



台南市政府發行

熱蘭遮城日誌第四冊

1655-1662

江樹生 譯註

臺南市政府
中華民國 100 年 5 月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熱蘭遮城日誌／江樹生譯註.臺南市：南市府，
民100.05冊；公分

ISBN 978-986-02-2919-6（第四冊：精裝）

1.荷據時代 2.臺灣史

733.25

100003912

熱蘭遮城日誌（四）

發行人：賴清德

譯註：江樹生

審稿：康培德・翁佳音

策劃：許耿修・劉怡蘋・葉澤山・林韋旭

校對：江樹生・范勝雄・王靜慧・楊淑芬

編輯：李雪慈・周淑美・哈蜀南・楊淑芬

序言翻譯：盧芳蕙・吳昆財

地圖繪製：黃清琦

索引：江樹生・王靜慧

編審：臺南市文化局 臺南市立文化資產管理處

發行所：臺南市政府

統一編號：1009901054

印刷：上校基業有限公司

出版冊數：一〇〇〇冊

發行日：中華民國100年5月

定價/精裝：新台幣1600元

**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V : 1655-1662

uitgegeven door
J.L. BLUSSÉ, N.C. EVERTS, W.E. MILDE
en
TS'AO YUNG-HO

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
Den Haag/2000

凡 例

- 一.本書根據荷文本「熱蘭遮城日誌」第四冊全文翻譯。荷文本全稱如下：《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Deel IV:1655-1662. Uitgegeven door J.L. Blussé, N.C. Everts, W.E. Milde en Ts'ao Yung-Ho (Rijks Geschiedkundige Publicatien, Grote Serie 241). Den Haag, 2000.
- 二.本文與註釋中有()括弧者，為荷文本原有的括弧；有【】括弧者，為譯者加入的解說。
- 三.註釋號碼後面()括弧內的數字，為荷文本原註的號碼；無()括弧者，為譯者所註。
- 四.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原則上保留原有的寫法。十七世紀荷蘭人根據聽聞，拼音書寫，因此同一人名、地名等名詞常有不同的拼寫法。其中，已為我國學界普遍通曉的人名與地名，於第一次出現時，中文之外還附記原文寫法，以後就基本上只寫中文名稱。
- 五.船名，都保留原有的拼音寫法，並於船名後面加上一個"號"字，以便識別。
- 六.遇有無法翻譯的專有名詞，以及不知何處的地名，均保留原有的拼音寫法，留待以後研究。
- 七.日誌第四冊，尤其是下半冊，插入不少書信等文件或資訊，中文本對插入的書信，在首尾各加一個方形括號□，用斜體字，並加上網底，作為識別；對其他的文件或資訊，則只加上網底，作為識別。
- 八.日誌第四冊到1662年2月9日結束，這天VOC的人員撤離熱蘭遮城堡，正式結束荷蘭人在台灣的佔據。但是，當時巴達維亞當局編輯檔案的人，把荷蘭人撤離城堡，在等候船隻出航期間的一些來往書信、指令、備忘錄等文件，也按照日期的前後收編在日誌之後。這些文件，中文本以附錄的形式編號置於日誌之後，用以方便引述。
- 九.本文中有者，即原檔各頁的翻頁處，其後的fol.為folio的簡寫，代表原檔的頁碼，通常一頁有正反兩面，正面標有頁碼，反面沒有頁碼。所以，學界通常在頁碼後面加上一個拼音字「r」表示正面的頁碼，在頁碼後面加上一個拼音字「v」表示反面的頁碼，中文本也如此沿用。

市長序

I

欣見《熱蘭遮城日誌》第四冊終於出版，這本書是歷時10多年浩大工程的最後完結篇，清德對於《熱蘭遮城日誌》一直相當關心，如今恭逢其盛，在縣市合併升格為直轄市之際，主持最後一冊出版，備感榮幸，也為有機會在臺灣史的研究歷程，參與最重要的一刻，盡一份心力，頗感安慰。

臺灣史研究先驅曹永和院士，畢生提出「臺灣島史」概念，堅持臺灣史的研究應以臺灣島做為研究主體，以架構出結構性、總體性和全球性的臺灣史觀，他的灼見已經是臺灣史研究的潮流與方向；遙想當年，臺灣全島原住民超過300多個部落的生活，漢人陸續移民入居臺灣，鄭成功勢力和荷蘭人勢力的消長，這些在臺灣本島發生的歷史，《熱蘭遮城日誌》都有記載。

自17世紀以來，臺灣進入世界貿易體系，隨著季節的不同，來自南洋各國的貨物，或是來自中國本土、日本、歐洲的貨物，在臺灣匯集交流，臺灣已經成為東亞重要的轉運站，《熱蘭遮城日誌》也為我們提供最好的明證。

與前三冊不同的是，在第四冊中，我們透過荷蘭人的眼光看到鄭成功揮軍來臺，迫使其退出臺灣殖民統治的各項紀錄，是對其後鄭氏王朝與漢族文化之建立，極為重要的研究資料。

《熱蘭遮城日誌》中文版從1999年第一冊出版，第二冊、第三冊也分別於2002年、2003年出版，第四冊在各方殷切的企盼下，終於在2010年完成翻譯註釋，並於今年順利出版，全書近58萬字，內容浩繁，是四冊日誌中記載最多規模最大者，大功告成，令人備感其中艱辛。

歷史必須在不斷承先啟後的情況下，才有永續發展的可能，《熱蘭遮城日誌》第四冊能完成出版，是許多人共同努力的成果，最感謝江樹生教授10多年來辛勞翻譯與註釋，以及臺南市文獻委員范勝雄最初提議翻譯，並且每一冊都悉心審查校對，有始有終陪伴《熱蘭遮城日誌》出版；本書順利完成，成為建構完整臺灣荷治時代以來歷史發展圖像的重要里程碑，這不但是臺南人的榮耀，更是臺灣人的驕傲。

臺南市市長 賴清德 謹識

2011年5月

譯 者 序

《熱蘭遮城日誌》中文本第三冊出版以後，荷蘭「國史館」(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的館長Dr. D. Haks對譯者說，他們出版的荷蘭國家史料叢書(Rijks Geschiedkundige Publicatiën, 簡稱RGP)還沒有一種刊物被整套翻譯成外文，《熱蘭遮城日誌》是第一個這樣做的刊物。現在《熱蘭遮城日誌》中文本第四冊，也是最後一冊，出版在即，譯者深感如釋重負。

回想《熱蘭遮城日誌》之能有刊本問世，要歸功於曹永和院士和包樂史教授(Prof. dr. L. Blussé)。曹院士年輕時，花了十多年的時間，用打字機把台灣大學圖書館保存的日據時期日本學者委託荷蘭專家從海牙古文書館手抄寄來台灣的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以下簡稱VOC)檔案中有關台灣的檔案打字保存下來，其中很大部份就是熱蘭遮城日誌。包樂史教授三十多年前從台灣、日本留學回荷蘭以後，因曹院士提供他珍藏的日誌打字本，得以在荷蘭展開熱蘭遮城日誌的長期編輯計畫，使熱蘭遮城日誌荷文本《DE DAGREGISTERS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由荷蘭國史館列入國家史料(RGP)大部頭叢書(Grote Serie)，分四冊出版：

第一冊(1629-1641)，RGP Grote Serie 195，1986年；

第二冊(1641-1648)，RGP Grote Serie 229，1995年；

第三冊(1648-1655)，RGP Grote Serie 233，1996年；

第四冊(1655-1662)，RGP Grote Serie 241，2000年。

若當年沒有曹院士這日誌的打字本，或沒有包教授進入萊頓大學歷史系工作，長期熱心推動這日誌的編輯計畫，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這台灣史上最早有連貫性又有份量的文字史料，到今天還不可能有刊本問世。

這本《熱蘭遮城日誌》第四冊，收錄五個日誌檔案，以大寫拼音字母A、B、C、D、E標示各檔案標題。這五個檔案的起訖時間為：1656年3月1日到1662年2月20日，前後七個年份。但是，跟前三冊一樣，日誌並不完整，有三個時段的日誌已經遺失，即：1655年11月7日到1656年2月29日的冬天三個多月；1656年11月22日到1657年3月9日的冬天三個多月；以及1658年3月到1661年2月之間的連續三十六個月。針對這種日誌遺失的缺憾，荷文本的編者辛苦地從VOC其他檔案選錄相關記述，撰寫〈補充資料〉，填補了日誌空白時段的一些內容。第四冊的這種〈補充資料〉，始自1655年11月，因此，雖然上述本冊所收五個檔案的日期始自1656年3月，第四冊的年代才會標為：1655-1662。

儘管日誌有如此遺失闕漏，保存下來的那三段有連續性的日誌，是相當有歷史性的史料。第一個時段是檔案A，1656年3月1日到同年11月21日，這期間日誌記

載的主要內容包括：1655年到1657年VOC巴達維亞當局派遣使臣去北京覲見順治皇帝的片段消息，他們企圖聯合清軍攻擊鄭成功以換取對中國的自由貿易，但沒有達成預期的目的。1656年3月的地方會議，是有日誌詳載開會情形的最後一次；1657年的地方會議，因疾病流行而取消了；1658與1659這兩年的地方會議，因日誌遺失，只能從其他資料窺見一二，詳細情形已不得而知；而1660與1661年的地方會議，則因鄭成功來襲的強烈風聲而取消了。山區的原住民，因拒絕遷居平地的命令，遭受荷蘭當局的敵視、攻擊，激起山區原住民的擴大抗爭，他們的抗爭持續到鄭成功率軍入台。1656年6月鄭成功下達百日後要禁航台灣的命令，荷蘭人本不以為意，但百日後實施禁航，台灣海峽的船運貿易急速衰退，加以這年10月台灣發生嚴重水災，造成近千人的死亡和財物損失，荷蘭人才驚覺事態嚴重。這年12月揆一以議長的官階，從長官Caesar接掌VOC的台灣政府，力圖恢復台海航運。雞籠、淡水地區的原住民叛服無常，派去該區的荷蘭人，死亡率很高，等等。

第二個時段是檔案B、C，1657年3月10日到1658年2月28日，這連續跨過四季時段的日誌，內容包括：因原住民村社疾病流行，情況嚴重，以致停辦1657年的地方會議。台灣的交易市場，因鄭成功的禁航而蕭條不堪，何斌乃銜命，代表荷方去廈門請求鄭成功取消禁航，重新開航，台灣海峽復航以後，台灣的經貿再度呈現繁榮景象。何斌敘述很多鄭成功在福建沿海活動的消息。1657年9月荷蘭人已聽到何斌替鄭成功收稅的傳說，但何斌否認。1657年10月揆一升任長官，揆一的時代正式開始。台灣的船運貿易再創高峰。

第三個時段是檔案D、E，1661年3月1日到1662年2月20日，這將近十二個月連續的日誌，內容包括：原住民已有領袖率領山區與平地的原住民對抗荷蘭人。1661年3月中，大員已有華人因鄭成功要來台灣的風聲而恐慌逃亡。這年4月30日，鄭成功率領大軍來到鹿耳門，入港登陸。從這一天到第四冊結束，約一半篇幅所記載的每一天，幾乎都跟鄭成功與荷蘭人的交戰、勸降、佈署、情報、決戰、談判、與締和停戰有關，也插入很多從各方面取得的鄭方的傳聞，為當時鄭荷交戰，以及鄭成功率軍進入台灣以後的活動最直接的第一手史料。

《熱蘭遮城日誌》本來就是VOC的內部文件，主要是要寫給VOC的高層人員看的，在字裏行間會有立場和主觀的強烈表現，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尤其在敵我交戰之際，這種情況更屬常見。可是，若捨去那些發洩情感的遣詞用字，著眼於對事實的描述，讀者將發現，這本《熱蘭遮城日誌》把鄭成功必須速戰速決奪取台灣，卻威嚇無效，作戰不利，軍隊缺糧，以致陷入膠著的困境，描述得相當翔實。也可以看出，那時，巴達維亞派出的援軍意外抵達台灣，曾使鄭方危急萬分，若非一場風暴將那些援軍戰艦驅離台灣約一個月，使鄭方得以從容籌謀對策，台灣的歷史諒已另走其他方向了。嚴峻的事實，促使鄭成功積極備戰，發動一場賭注性很高的空前大砲戰，終於擊潰烏特勒支碉堡，迫使荷

人求和，雙方才開始談判締約，結束戰爭，使荷蘭人安然退回巴達維亞。

從1661年4月30日鄭成功率軍登陸台灣，直到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退出台灣，《熱蘭遮城日誌》都逐日記載，保存無缺，相當難得。而且，當時寫日誌的人，事無巨細，看到就寫，聽到就寫，感到也寫，也抄錄不少來往書信文件，充分表現出烽火中還能持續大量記錄的沈著勤奮。想像豐富的人，大可跟著日誌的描述，自行在腦海放映一幕幕鄭荷交戰的劇情，客觀細心的讀者，也可從中獲得眾多貼切的新瞭解。被敵人稱讚，是不常見的事情，但《熱蘭遮城日誌》卻留下多處對敵人鄭成功及其軍隊遭遇艱困與蘊涵讚許的描述。

《熱蘭遮城日誌》第四冊是這日誌的完結篇，是記錄荷蘭人佔據台灣三十八年最後幾年狀況的重要又直接的文獻。歷史的大轉變，都不能沒有原因。台灣之所以會從荷蘭人的統治轉而變成鄭成功的統治，也必然不能沒有原因。而原因常常是從錯綜複雜的多元因素滋生，經過長期主客觀無法適當處理的演變，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就爆出火花。《熱蘭遮城日誌》留下不少這種錯綜複雜的問題的描述，留待後人研究，同時，提供相當豐富而且有連續性的文字史料。

《熱蘭遮城日誌》中文本四冊能全部由台南市政府前後出版，譯者深感榮幸，衷心感謝。第四冊翻譯後，承蒙翁佳音教授與康培德教授百忙中撥冗審稿指教，得以改正不少錯誤，謹此敬致謝忱。譯者在成功大學史學研究所的學生李佩蓁、黃瓊儀、石文誠、蘇慧雲、李瑞源、王秋薇、廖安惠、和林孟欣博士，熱心協助校對文稿，林孟欣博士還為本冊製作索引，並辛勞總體整理，台灣歷史博物館的黃清琦先生為本冊繪製「鄭荷交戰地圖」、「明清之際閩南地圖」與「2010年閩南地圖」，方便讀者閱讀比對，在此向他們表示謝意。

《熱蘭遮城日誌》的翻譯已告段落，這十幾年，樹生得到很多師友、讀者、與社會賢達的不吝指教，特別對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師其昀的厚愛，台北漢聲出版社，台南市政府，台北西區扶輪社，與國家文化總會的肯定信賴，新光企業董事長吳東進先生的鼓勵支持，內人曾玉津女士的辛勞陪伴，樹生要藉此衷心致謝。

譯者才疏學淺，錯誤難免，敬祈讀者賜教斧正為禱。

江 樹 生

二〇一〇年四月

來自荷蘭的祝賀

超過一個世紀之前，既已長期著手出版的計劃任務，隨著江樹生教授中文翻譯的大員《熱蘭遮城日誌》的完成，終於局部付梓了。

1887年，德國歷史學家里斯（Ludwig Riess）受聘為東京帝國大學首位國際關係史教授，對撰寫遠東近代史，他認為必須重視荷蘭的文獻資料。於是，此後的許多世代，日本史學家在打開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文獻上，不僅是對日本，更間接對中國的史學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整套所謂的《巴達維亞城日誌》（Daghregisters van Batavia）（巴達維亞城，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的總部）之中，有關 17 世紀的台灣與日本的資料，率先由村上直次郎翻譯成日文，由中村孝志校注，成為日本歷史學者進入豐富的荷蘭文獻檔案的先河。之後，日文版也被譯成中文。

五十幾年前，當時在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工作的曹永和教授開始進行《熱蘭遮城日誌》的打字工作（熱蘭遮城是荷蘭1624-1661在台灣殖民統治的總部）。此外，當時任教於國立台灣大學的前身——台北帝國大學的岩生成一（Iwao Seiichi）教授，也早在1930年代把很多荷蘭海牙國家檔案館的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檔案的原始手稿的複製本帶來台灣。

我在1970年代就教於曹教授，每遇到他府上拜訪，他總是向我展示，《熱蘭遮城日誌》中的許多詳細資料，不但可以發現有關荷蘭在遠東的海上貿易與島上的殖民，甚至還有關於台灣原住民的部落社會，以及直到荷蘭時期才真正開始的，來自鄰近福建省中國移民的遷居情形。

當我在1972至1975年於日本留學時，幾乎每週都與在天理大學的江樹生教授見面，我們都追隨中村孝志教授研究，並協助他為正在編輯《巴達維亞城日誌》的最後一冊做註腳。當我們三人談到這些古荷蘭資料的價值，我更是再次想到，當我在台灣就學於曹永和教授時，他所曾向我展示的台灣《熱蘭遮城日誌》更具價值。

返回荷蘭幾年後，我獲得來自「荷蘭科學研究組織」（NOW），以及「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的經費補助，並與一群投身於荷蘭文的夥伴們，共同複製並且編輯全部的原始日誌檔案，進而出版了四大冊（ING Publishers, 1986-2000, Den Haag）。這四冊後來成為江樹生教授所譯中文版的文本。

現在我們慶賀江樹生教授所翻譯的第四冊，也是最後一冊《熱蘭遮城日誌》的出版。這一部記載早期台灣歷史的重要資料，終於可為所有中國歷史學者使用。不過《熱蘭遮城日誌》只是所有被保存下來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文件中，有關荷蘭時期台灣歷史的一小部份。我真切盼望，這本書的出版只是一個開始，還有許多更有價值的檔案文件應被翻譯出來，以便能夠為更近一步了解台灣在清朝早期，作為中華帝國一部分的傳說做出貢獻。

熱蘭遮城日誌荷文本主編
荷蘭萊登大學歷史系教授
包樂史(Prof. dr. Leonard Blussé)

A congratulatory message from Holland

With the completion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by Prof. Chiang Shu-sheng of the Dutch diaries of Zeelandia castle of Tayouan a long term publication project which was initiated more than a century ago has partially come to an end.

When in 1887 the German historian Ludwig Riess was appointed as the first professor of the history of foreign relations at 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 he drew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Dutch archival sources for the writing of the early modern history (chintai shih) of the Far East. Ever since, several generations of Japanese historian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opening up the archives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VOC) not only for Japanese but indirectly also for Chinese historians. The Japanese annotated translation by Murakami Naojiro and Nakamura Takashi of all seventeenth century data on Japan and Taiwan in the so-called Dagregisters van Batavia (The Diaries of Batavia,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VOC in Asia) was the first step to accessing the rich Dutch archival holdings to Japanese historians. This Japanese publication was subsequently also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More than fifty years ago Professor Tsao Yung-ho, who was then working as a librarian at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started to type out the diaries of Zeelandia castle, the headquarters of Dutch colonial rule in Taiwan (1624-1661). Hand written copies of the original manuscripts in the VOC archives at the National Archives at The Hague in the Netherlands had been brought by Prof. Iwao Seiichi to Taiwan in the 1930s when he was teaching at Taihoku Teikoku Daigaku, the forerunner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hen I was studying with Professor Ts'ao visiting him weekly at his home in the early 1970s, he often showed me how much detailed information could be found in the Zeelandia diaries not only about Dutch maritime trade in the Far East and the colonisation of the island, but also about the tribal societies of Taiwan's aboriginal populations and the immigration of Chinese settlers from nearby Fuchien province which did not really start until the Dutch period.

When I studied in Japan between 1972 and 1975 I almost every week met with Prof. Chiang Shu-sheng at Tenri University, where we both followed seminars with Prof. Nakamura Takashi and assisted him in making the footnotes for the last volume of the Batavia jo Nisshi that he was editing. While we were the three of us were discussing the great value of these old Dutch sources I was reminded again of the even greater value for the history of Taiwan of the Diaries of Zeelandia castle, which Prof. Tsao Yung-ho had shown me when I was studying with him in Taiwan.

A few years after my return to the Netherlands, I was able to secure financial backing from the Netherlands Organisation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NWO) and the Chiang Ching Kuo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Exchange and with a group of devoted Dutch collaborators we were able to copy and edit all the original diaries and publish them in four tomes. (ING Publishers, 1986-2000, Den Haag). These volumes constitute the text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by Prof. Chiang Shu-sheng.

We now can celebrate the felicitous event of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ourth and last volume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by Prof Chiang Shu-sheng of the Diaries of Zeelandia castle. Hereby an important source for the writing of the early history of Taiwan has become available to all Chinese historians. Yet the Diaries of Zeelandia castle constitute only a small portion of all preserved VOC archival documents on the Dutch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 I do hope that this publication will be only the beginning of the translation of many more useful documents that may contribut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founding tale of Taiwan as a part of the Chinese empire in the early Ch'ing period.

Leonard Blussé

《熱蘭遮城日誌》第四冊

荷文本原序

IV

這本史料刊物最後一冊 -- 1655年到1662年2月--也沒有包括那幾年全部の日誌。有三處空白，其中最後一處空白長達三年(1658年3月到1661年3月)。

對這原檔闕漏的部份，編者也運用其他資料設法補充。如同前幾冊那樣，這些補充資料用斜體字印刷，資料主要來自《總督一般報告(Generale Missiven)》、《巴達維亞城日誌》和VOC手寫檔案，還特別使用了福爾摩沙末任長官揆一(Frederik Coyett)用以反駁的著作《被忽略的福爾摩沙》。¹

一些技術上的說明

A. 關於本文。保存在VOC檔案裡的熱蘭遮城日誌全文出版。資料的抄寫法根據荷蘭歷史學會(Nederlands Historisch Genootschap)的規則抄寫。本冊各件日記檔案分別以A到E標示。本文在每頁的上端，都用大寫字母標示該日記檔案。在大寫字母後面的數目字是原檔的檔案葉碼。正文左旁及索引的頁碼是各檔案原來的葉碼。此外也請讀者注意，十七世紀的文字拼法變化很大，很不一致。尤其是，福爾摩沙人的姓名及其地名的拼法變化更大。

B. 關於註釋。所有原檔裡的資料、文獻、人物、模糊不清之處，都用所需的數字標註。

正文有三個層次。日記本文。在日記本文中插入的文件，例如日記採錄的提報者的報告或書信，這類文件在起頭和結尾都用□符號標示。在這插入的文件中再插入的其他文件，其起頭和結尾都用□□符號標示。

有些明顯的錯誤，編者根據國史出版規則予以改正，於需要時並用括弧標示。在原檔中闕漏的數目或人名，以三個句點標示。

日誌原文經常出現請參閱決議錄、書信或其他文件的寫法。關於這些要參閱的檔案，如果還存在於荷蘭國家總檔案館的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檔案裡或其他專輯裡的，都盡量註明出處。這類的註，都註明該檔案的性質、書寫的地點和日期，以及檔案的編號與葉碼。但因很多檔案已經沒有保存在該檔案館裡，所以無法參閱，在註裡即標明找不到。

¹C.E.S., 《't Verwaerloosde Formosa, of waerachtig verhael, hoedanigh door verwaerloosinge der Nederlanders in Oost-Indien, het Eylant Formosa, van den Chinesen Mandorijn, ende Zeerover Coxinja, overrompelt, vermeestert, ende onweldight is geworden.》1675年，出版於阿姆斯特丹。1991年由G.C. Molenwijk修訂，由Zutphen的Walburg Pers以原來的書名再版，列入《Werken uitgegeven door de Linschoten-vereeniging, Deel XC》(林思豪頓協會出版叢書，第90冊)。如本序文提到那樣，這本書因情緒與極端偏見，應該配合熱蘭遮城日誌第四冊來閱讀。在日誌裡看到的很多人，都被揆一更加論斷。

這原則也適用於人名的註釋。熱蘭遮城日誌各冊裡的人名註釋是應該統一的，不過有些以前被註釋的人，因為後來擔任的公司任務完全不同，所以重新予以加註。他們的身分職稱，在人名索引裡用括弧標示。福爾摩沙人，中國人和日本人的人名資料相當缺乏。至於為VOC工作的歐洲人的人名註釋，主要運用的資料是福爾摩沙的長官與議會決議錄。有些人的註釋還運用其他資料，例如巴達維亞的總督與東印度議會決議錄裡的職員名冊(這些名冊關於這段期間的並不完整)，巴達維亞的發信簿(Uitgaand Briefboek van Batavia)和船上軍人名冊(Scheepssoldijboeken)。關於文獻，我們採用W.Ph. Coolhaas編的《總督一般報告》裡的註釋，也採用F.W. Stapel和C.W.Th. van Boetzelaer van Asperen以及Dubbeldam加註的Pieter van Dams的巨作《Beschryving van 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裡的註釋。

難字的解說請參閱本冊附錄的難字釋義表，也請參閱其他各冊附錄的難字釋義表。地名索引也請參照第二冊所附歷史地名表。編者考慮很久，決定在最後這第四冊不刊出台灣歷史地圖。為此所需的資料迄未達到可以出版的階段。擔任歷史地名研究的台灣編輯還在研究中，在VOC時代福爾摩沙地名的地圖得以完成以前諒必還需數年。

在這長達約二十年的這計畫即將結束之際，現任的編輯要感謝幾位協助完成這些檔案文字的人。首先要感謝檔案專家Margot van Opstall博士和Marius Roessingh碩士，感謝他們在本計畫的初期那麼熱心協助合作。他們兩位都於1986年，甚至都還未能看到第一冊的出版，就去世了。這期間，編輯委員江樹生教授已經開始將這史料刊物翻譯成中文，使台灣關懷的人得以直接閱讀這重要史料。

我們也從台灣的專家學者翁佳音和康培德等人獲得建議，也承蒙荷蘭歷史研究所(Instituut voor Nederlandse Geschiedenis)的Frans Aussems再次認真協助排版工作，使這計畫及時完成。

最後要特別感謝，五十年前，當時三十歲的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館員曹永和先生，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受日本人委託從海牙抄來的檔案開始拿來打字。『邊做邊學』那時他大概這麼想。果然，他就這樣逐漸成為關於台灣的十七世紀VOC檔案的大學者，而且，還進而成為關於遠東整體的大學者。五十年後的現在，曹永和教授已經成為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和榮譽教授。回顧他眾多刊物問世的漫長歲月，在福爾摩沙這領域，啟發鼓勵了台灣的新世代和外國的專家。而這最後一冊，能在曹教授八十大壽出版，使我們其餘的編輯格外欣慰興奮。

歷史概述

朝向終點前進。那個最後被冷落的福爾摩沙末代長官揆一，在他1675年出版為自己辯護的書裡指出，失去該島有兩個主要原因：巴達維亞當局未能及時派遣援軍來對抗忠於明朝的軍閥國姓爺的入侵威脅，以及他們不肯給福爾摩沙修復非常需要的要塞的特別經費。

對福爾摩沙島的荷蘭政府的歷史比較瞭解的人都知道，VOC在這島嶼的狀況

已有相當時間不怎麼好了。我們在第三冊的序言裡已經講過七年豐收七年歉收的事情，現在看到，十七世紀的五十年代，VOC殖民時期的這最後階段，已經完全籠罩在中國內戰的陰影下：1644年進入北京的清朝皇帝的軍隊，越來越深入忠於明朝的鄭成功在中國沿海的各省，逼得他向海外另找據點。

鄭成功模仿他父親的作法，他父親已經多年被囚禁在北京，用他從海上搶劫來的，以及跟日本，及其鄰近的西班牙人的馬尼拉與荷蘭人的大員海港通商貿易的收入，來支付他軍隊的開支。照他自己的說法，他的商人在馬尼拉與大員被壓榨欺負的情形說：「他們在那裡只被當作被人吞吃的魚或肉，而不被當人看待。」所以他在1656年6月27日下令所有船隻禁航馬尼拉與大員(A fol.249)。有人說，國姓爺這樣禁運，是要使這兩個海港衰弱下去，等到時機成熟，就可更容易地併入他的海上貿易帝國裡。由於船隻的停航以及中國商人從福爾摩沙被召回中國，隔年荷蘭人的這海港果然沒有中國戎克船來，使公司的營運深受打擊，特別是依賴中國運來的黃金在交易的科羅曼德爾沿海的貿易打擊更重。

中國的內戰也造成福爾摩沙其他方式的壓力。1658年和1659年，這兩年都沒有日誌留下來，有兩萬五千多福建人逃亡來台灣。那時，曾經到處謠傳，國姓爺快來了，於是那些中國移民立即將他們的婦女送回中國去。

另外一個使熱蘭遮城堡在日本與東南亞轉運功能變成問題的因素，是大員海道，那個有著良好港灣的出海港道的淤沙問題。吃水20呎的大船，再也不能進入在大潮時也不過12呎深的這港口去停泊在倉庫前面。她們必須去停泊在澎湖群島，或停泊在港外的沙洲前面，在大海裡用小船裝卸貨物。反覆無常的氣候環境，對推展貿易也成為嚴重的阻礙。因此，大員是否具有公司在中國海域貿易轉運中心的功能，也變成問題了。

台灣的中國移民大部分來自福建，跟這樣的福建中斷貿易關係的期間，對島上的社會生活自然會有不良影響。一方面，出口商品例如鹿肉和魚干的價格下降，另一方面，中國貨物因為嚴重缺貨而價格高漲。這種情形，使那些賻商無法繼續支付約定好的賻金。有些人倒閉了。換句話說，這島上的社會生活，其實是鄰近中國那沿海經濟的一部份，雖然熱蘭遮城堡的人並不願如此承認。何斌是遭受如此經濟蕭條的犧牲者之一，他是人頭稅的賻商，也是公司的翻譯員，他代表公司去跟國姓爺交涉。

除了這些問題，自然災害也造成災難，就像1656年10月那可怕的大颱風。熱蘭遮城日誌的寫者看到那陸上和沿海嚴重的災害，嘆息地說：「祈求萬能的神，從我們和這些可憐的土人縮回祂打擊的手臂，相反地，請保佑我們大家，得免遭受這麼多悲傷的事故。」頑強的疾病和流行病也又再發作，特別在該島的南部和北部，以致年度的地方會議數次因健康問題而必須取消舉行。曾經有人提議離開該島北部那不健康的淡水和雞籠，但這提議後來被取消了，因為害怕競爭者會去佔領那裡。那些地區教會人士與政務人員的高死亡率，使那邊的荷蘭人變得很少。沒有牧師願意再去南部居留，他們只輪流去那裡的村社巡視而已。有兩個與眾不同的人，因他們強烈的意志和強壯的身體，自告奮勇去那些地區。當1642年在淡水興建碉堡時，隊

長Thomas Pedel就自許可以化解北部叛徒問題的人，應召去那裡。這個久經戰場的老將，於1661年在對抗國姓爺的入侵部隊時，英勇陣亡。Hendrik Noorden也自願擔任不健康的南部地區的政務員，他在那地區恢復了一些權勢。他後來在福爾摩沙遭遇戰亂中的驚險經歷，令人恍若觀看一齣冒險影片。有82個人，男女和小孩，在他的帶領下，從該島東部被孤立的卑南，橫越敵人的地區，來到打狗沿海約定好的地方，在那裡，於熱蘭遮城投降前不久，被公司的一艘船救了出來。

1650年代最後幾年，因中國不斷傳來不吉祥的消息以及福爾摩沙本身困難的生活狀況，熱蘭遮城堡瀰漫消沈的氣氛。尤其，1656年12月26日從前任長官Cornelis Caesar接棒的長官揆一(Frederik Coyett)，更是肩負重任，前景茫茫。在一串長年的衝突中，他被捲進跟以前的長官Nicolaes Verburch(1650-1653)對立的爭執，這期間，Verburch升任巴達維亞東印度議會議員，多方阻擾抵制他。《被忽略的福爾摩沙》的讀者很快就會感到，VOC之所以喪失台灣，主要原因，不外乎VOC高層主管之間失控的爭執，這些爭執也導致兩個人成為那兩次派遣援軍的司令官，即：1660年那個為自私自利而出航的Jan van der Laan，和1661年那個懦夫Jacob Caeuw，而那些高層主管還以此自詡。不過，對鄭成功軍隊的入侵，以及熱蘭遮城持續九個月的圍攻，有極其詳盡記載的熱蘭遮城日誌，將給人完全不同的感覺。尤其，在日誌裡收錄的荷蘭當局與中國統帥之間那些持續不斷的來往書信，必將道出，誰是事實的敵人。

開始，他們還為禁止貿易與荷蘭人的海上搶劫互相寫信，到1660年秋天，國姓爺要來侵入台灣的風聲非常強烈，長官揆一乃於10月31日寄信去問國姓爺，他意欲如何？國姓爺回答說：「他不習慣公佈他的計畫，不過常會聲東擊西，心中有數。」同時告訴他說，目前對那「長小草的土地」尚無任何計畫。他正忙於對抗滿清的軍隊。國姓爺較早的書信裡，從未令人懷疑，福爾摩沙係屬於他祖先的，所以現在是屬於他的。

1661年4月30日，結果變成：「早晨六點半，那時，是平靜無風而有霧的天氣，我們看見，…有不尋常的眾多中國戎克船，向鹿耳門下來，顯然，是從中國來的國姓爺的軍隊。」果然，這個中國的軍閥親自率領三百艘戎克船，搭乘兩萬多人的水手和士兵，要來討回這個島了。從一開始，大員的議會已經很清楚知道，由於敵方強大的軍隊，公司在福爾摩沙島上所有的一切都將被奪去。在赤崁那普羅岷西亞城堡，遲早一定會投降。因此，他們趕緊把荷蘭人從那大員市鎮召回熱蘭遮城的高牆裡面。於是，他開始耀武揚威，嚇唬圍城。國姓爺以高調勸降，但揆一拒絕。使者一再來回被派。城堡裡的人從那些使者，也從對方逃來或捉來的人，試著打聽中國統帥那邊軍營的活動狀況。在這對抗的第一週，當Paulus Ossewayer先生被國姓爺派去城堡時，他把他們在敵營的狀況描述得有點太好，所以長官把他隔離在一個小房間，以免那些軍人聽到他的敘述而產生錯誤的念頭。

寫熱蘭遮城日誌的人，對1659年逃去投靠鄭成功，並促使他入侵台灣的那個叛徒何斌的行動狀況，也從遠處追蹤。他以直率幸災樂禍的筆調，一次又一次記

載這個以前的翻譯員已經如何被國姓爺冷落，孤單地去住在一個小茅屋裡，因為圍攻城堡沒有像他遊說那麼容易進展。不過，漸漸開始有VOC的士兵逃去敵人那邊。晚間，城堡裡的人和逃去投敵的人之間，有時互相對罵。1661年10月14日那場粗魯的對罵，真是罵到入骨。(參閱D fol.807v)

在那期間，城堡裡的人用盡各種辦法要擊敗逐漸逼近的敵人，但都沒用：出擊失敗了，派來救援的Jacob Caueuw的艦隊沒有紓緩局勢，想跟韃靼方面的福建副王靖南王聯手攻擊鄭成功的計畫也終成泡影。1661年12月16日，Hans Jurgen Radis van Stockaert逃去鄭成功那邊，告訴鄭成功城堡駐軍薄弱的情況，還指出如何先攻取城堡對面那高地上的烏特勒支碉堡，來攻取城堡。從那高地輕易可以用大砲控制城堡以及這海灣的入口。1662年1月25日，那個碉堡在持續的砲擊下被擊碎而放棄了。隔日，長官揆一在福爾摩沙議會的決議下告訴對方，他願在條件下舉城堡投降。2月1日締訂停戰條約。獲准自由撤離的荷蘭人員開始上船。他們對被中國人俘擄那五百多男女和小孩的命運一直不很清楚，不過知道有幾個教師和牧師被釘十字架。直到現在，他們才知道，所有那些人，除了少數幾個高階職員之外，都已被國姓爺下令處死了。

1662年2月8日，除了幾個失落的婦女與孩童之外，所有的荷蘭人都搭上停泊在岸邊的公司的船隻。就在這時，長官揆一把城堡的鑰匙交給中國將領Sauja。

回到巴達維亞以後，長官和他的議員們被法庭傳訊，被判叛逆罪。²揆一被判終生流放班達(Banda)群島。1674年，這位福爾摩沙的末任長官，因荷蘭攝政(stadhouder)威廉三世的求情，獲得釋放。他雖然深受侮辱，卻全無創傷，回到祖國，就迅速出版他的辯護論著，對公司伸張他的公正，說：「再見了，先生們，這次，就這樣接受我笑著敘述的真實情形吧。」

²參閱《't Verwaarloosde Formosa》，pp. 212-224.

Leonard Blussé
Natalie Everts
Wouter Mil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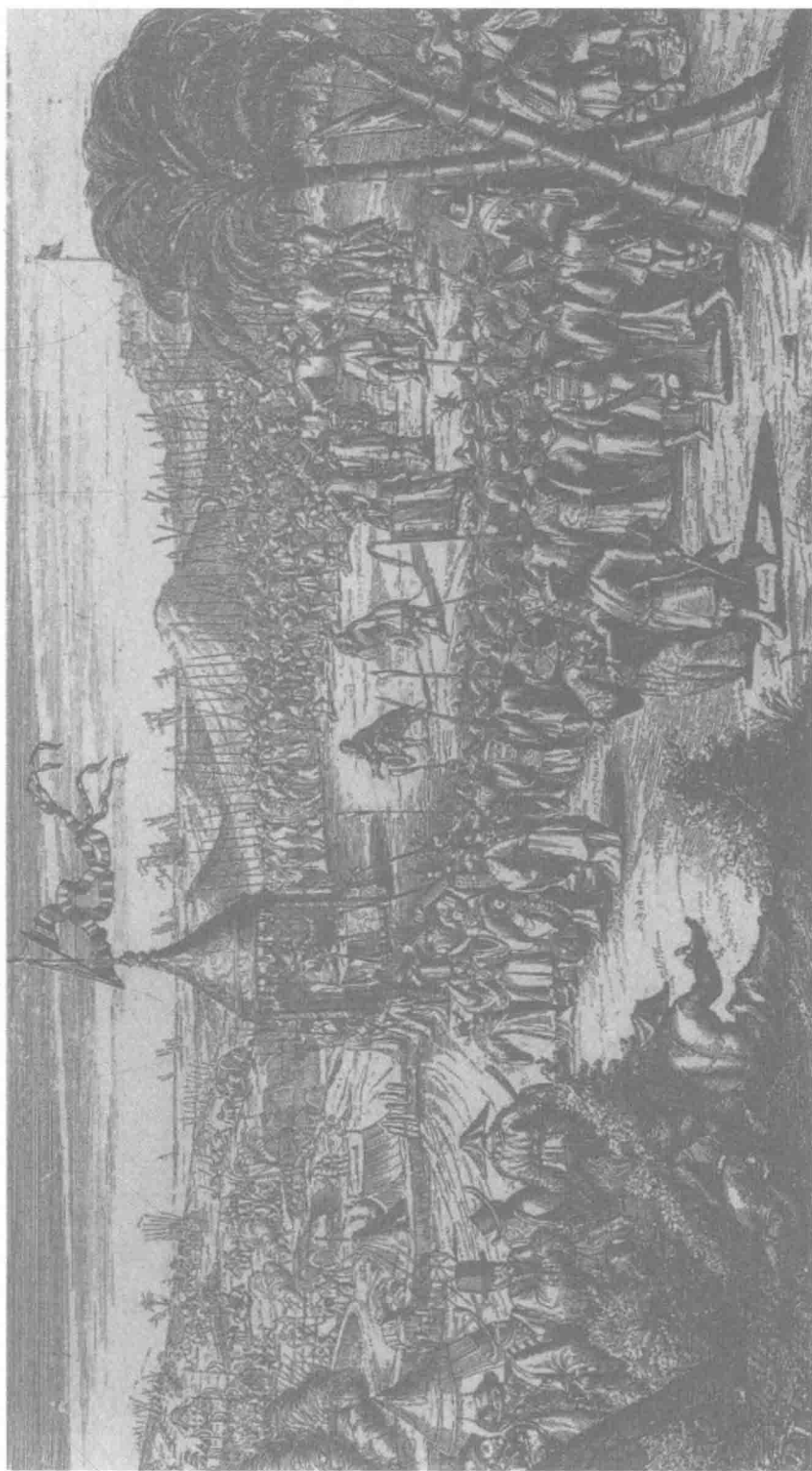


插圖1，鄭成功接見荷蘭代表圖

1661年5月3日鄭成功在赤坎普羅岷西亞城堡附近他的軍營接見荷蘭代表，商務員Thomas van Iperen與稅務員Leonard de Leonardus。Jan van Baden的銅板畫，引自C.E.S.《't Verwaerloosde Formosa(被忽略的福爾摩沙)》(阿姆斯特丹，1675)，第二冊，10。

事件請參閱：本日誌D，VOC 1235，fol. 534-540。

來源：海牙國立檔案館的圖書館。